



## 林獻堂與台灣文化協會\*

● 林柏維\*

### 1. 正港的台灣家族

誰是林獻堂？

在這一塊土地上，八、九十年前發生了什麼可歌可泣的故事？歷史灰飛湮沒之後，在歷史失憶的狀態下，一切都過去了，與被殖民、被壓迫、被奴役的鬥爭，彷彿都不曾存在似的，20世紀末葉，本土意識逐漸覺醒，蔣渭水、賴和等台灣菁英始能從歷史的夾縫中窺見陽光，然而誰在乎台灣第一人：林獻堂？

在台灣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家族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家族的興衰過程可以是一個區域，乃至整體社會發展過程的縮影！而家族成員在不同的時代裏引領風騷，也關係到家族的起起落落；觀看日治時期的五大家族，鹿港辜家與高雄陳家、基隆顏家，因緣於時局轉換並與統治者搭線，迅猛崛起；同屬興旺於清代的板橋林家、霧峰林家，在歷史轉換的變局裏有著類似的選擇：先是避秦於原鄉，繼而歸返台灣，並面對統治當局的安輯綏撫，繼而與統治者建立親密的關係，然而不同的是：霧峰林家的雙元選擇，林烈堂妥協於時局，林獻堂選擇了台灣民族運動的不歸路。

我們如何去看待霧峰林家的雙元選擇的歷史問題呢？下厝系統的林文察有功於戴潮春事變、林朝棟率義軍奮起於台灣民主國、林祖密參與孫中山的二次革命，祖孫三

\* 本文係 2013.7.3.應邀於台北市立第一女中（教育部高中新課程國文學科中心）於台中霧峰明台中學主辦之「從阿罩霧到半線文化巡禮」的演講稿。

\* 林柏維，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助理教授。

代軍功顯耀；頂厝系統的林文欽也不惶多讓，1895 這一轉換的年代，迫使林獻堂早熟，未滿二十之齡即承擔穩固家業的重責，然而，傳承於家族的民族意識使其在被殖民統治的時空下，猶然堅定民族主義的心志。探究林獻堂的政治生涯，其溫文儒雅來自於有舉人功名的父親林文欽，其祖國意識緣由於下厝族親，霧峰林家的環境薰陶使他在民族運動的過程裏，扮演著溫和的、改革的、祖國派的領袖角色。



## 2. 民族運動的火苗

1907 年，林獻堂偶遇梁啟超於東京奈良，以「台灣該當如何？」相詢，梁啟超認為：「三十年內，中國絕無能力救援你們，最好效愛爾蘭人之抗英，在初期愛人如暴動，小則以警察，大則以軍隊，終被壓殺無一倖存，後乃變計，勾結英朝野，漸得放鬆壓力，繼而獲得參政權，也就得與英人分庭抗禮了」<sup>1</sup>意即：以愛爾蘭獨立模式，以議

<sup>1</sup> 林獻堂向梁啟超詢問：「我們處異族統治下，政治受差別，經濟被榨取，法律又不平等，最可悲痛者，尤無過於愚民教育，處境如斯，不知如何而可？」（甘得中〈獻堂先生與同化會〉，葉榮鐘編《林獻堂



會路線進行台灣的民族運動；梁啟超並欣然受邀，於 1911 年來台，與櫟社詩人林幼春等人酬酢於萊園，對照於林獻堂日後不棄不捨地進行議會設置運動，有跡可尋。

1913 年，林獻堂踏出他從事社會運動的第一步，與林紀堂、林烈堂、辜顯榮、林熊徵、蔡蓮舫等台灣仕紳，向總督府申請設立台中中學。

台中中學的創設導因於日本統治台灣的教育政策，傳統的書房教育因科舉制度的不存在漸失魅力，而日本在台灣雖大力普及新式的公學校（小學）教育，然而在「愚民政策」（要使被統治者沒有智識能力，組織無能化，使廣大的被統治群眾成為供給勞力的被奴役者。）的統治基調下，上一層級的學校僅有實用的「國語學校（1896 年）、台灣醫學校（1899 年）、農林學校（1919 年）、商業學校（1919 年）」，台灣青年如想繼續接受中等以上的教育，除此之外，只有海外（主要是日本、中國大陸）留學一途。

林獻堂除了將其子女送往日本之外，也資助貧苦青年，得到支助的畢竟是少數，1912 年，林獻堂以祖母壽辰禮金為獎學基金，後擴大募集，轉而於 1913 年 9 月向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提出請願創設私立台中中學，幾經波折，最後以辜顯榮及林烈堂的名義，代表蔡蓮舫等 83 人，於 1914 年 2 月向總督府捐獻校舍，換取以專收台人子弟的條件，公立台中中學創校。

1913 年 5 月，林獻堂到北京回拜梁啟超後，轉回東京，經由王學潛引介在野的明治維新元老板垣退助，<sup>2</sup>1914 年 3 月，板垣訪台後，決心創立「台灣同化會」，板垣退助認為東亞若要安定，須中日合作，而台灣人是中日親善的關鍵。1914 年 12 月，集結台灣各地仕紳的同化會成立。<sup>3</sup>但是台灣總督並不樂見此一組織的存在，於 1915 年，以紊亂社會秩序為由予以解散。

台中中學的創校雖未如初衷，卻是林獻堂集結台灣上層仕紳的實力展現，板垣退助正是借重林獻堂的號召力而組建同化會，同化會是否能消弭日台人差別待遇已非要事。經由這兩事件，台灣各地仕紳有了串連的契機，林獻堂也隱然已是台灣人的領袖。

---

先生紀念集（卷三追思錄）》，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版，1974.12.，頁 519~521。）

<sup>2</sup> 「板垣認為可利用台灣實現他的政治理想，於是便以林氏為知己，拿他作渡台的橋樑。」張深切《里程碑》，台中，聖工出版社，頁 96~97。

<sup>3</sup> 「可以說是當時台灣社會上的上流人物，實際上大部份的會員都是區長、參事、保正等身膺榮職的縉紳。」葉榮鐘《台灣民族運動史》，頁 20~21。

### 3 文化協會的年代

1920 年代，是以台灣文化協會為主體的社會運動狂飆的年代，他們以文化運動的方式，拓展出爭取政治權益的全民運動，以農民運動、工人運動的方式，展開階級的、民族的運動；他們以台灣文化協會為主體，主張「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sup>4</sup>。

相對於整個國際環境，一次世界大戰後：新帝國主義的形成、社會主義浪潮的湧現、西方民主社會體制的抬頭、中國歷史朝代的更新，相輔而成國際潮，台灣則經由日本「母國」而介入。由於歸屬的相互關係，日本社會之於台灣自然成為媒介，受日式現代教育的知識菁英所選擇之運動方式即在此國際潮中前進。<sup>5</sup>

這國際潮包括了：民族自決的潮流<sup>6</sup>、列寧革命對中國革命的影響<sup>7</sup>、愛爾蘭獨立運動模式的仿效、朝鮮三一事件的推波助瀾<sup>8</sup>、大正民主的歷史時空<sup>9</sup>。留日新青年在這樣的時空環境下，思慮台灣的前途，集結在蔡惠如、林獻堂的領導下組織啟發會、新民會與台灣青年會，先是擬議六三法撤廢運動，轉而進行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相對應於留日新青年的積極作為，島內以台灣醫專、師範學校出身為主的菁英，推舉蔣渭水為領導，共謀出路，先是成立文化公司，繼而取得林獻堂的首肯，1921 年 10 月 17 日，在台北靜修女中成立以「謀台灣文化之向上」為目的的台灣文化協會，會員 1032 人，林獻堂為總理，蔣渭水為專務理事（後為蔡培火），文化協會的組成代表著傳統士紳、海外留學生、本土知識菁英三個社會階層的結合。

文化協會成立後，迅速發展它的組織，分立台北、台南、彰化、員林、新竹等五

<sup>4</sup>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字句見於：蔡培火〈我島與我等〉，《台灣青年》，期 4，頁 4，1920

<sup>5</sup> 林柏維《台灣文化協會滄桑》，頁 20-52。

<sup>6</sup> 第一次世界大戰，威爾遜民族自決的主張促成東歐、西亞民族國家的獨立。

<sup>7</sup> 中國革命的成功激勵了新知識青年寄託新中國把革命的目標轉向台灣，孫中山的思想及其動向成為有志者（蔣渭水）學習的榜樣，祖國情結成為與對岸相脈動的根源，也伏下日後中、日、台三角關係的思想、路線糾葛。

<sup>8</sup> 1919 年，朝鮮高宗暴死，釀成反日風潮，李承晚組臨時政府雖失敗，卻換得地方自治，同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也應起而仿效。

<sup>9</sup> 主張民本主義的吉也作造組織新人會（1914）、黎明會（1920），使民主主義在日本蔚為風潮，留日學生受此薰陶，思想大開，加上 1919 年田健治郎任台灣總督，文官統治時期開始，給與知識菁英有了社會結社的空間。



個支部，並且支援每一回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然而，文化運動所形成的磅礴氣勢，使台灣總督府採取了壓制的措施，先是以公益會來反制，並以有力者大會來反擊，進而於 1923 年 12 月以違反治安警察法為由全島大逮捕重要幹部，此即治警事件，文化協會受此衝擊反而更加蓬勃發展。

文化協會啟蒙運動的目標在於喚醒台灣民族意識，進而爭取政治權，造成民族自決的氣勢，以期脫離日本統治，林獻堂說：「要以改造的精神（在）造堅牢的大舟以準備航海。」就是這樣的意思。

啟蒙運動為主的文化運動是多面向的，在訊息的傳遞上，他們發行會報、設讀報社；在教育的層級上，他們辦夏季學校、設立文化書局和中央書局；在知識青年的結合上，他們協助青年團體的組成；在文化種子的傳布上，他們推動白話文的使用；在社會風氣的開通上，他們提倡新劇，組電影隊。在經濟面的抗爭上，他們成立本土資本的銀行；最重要的是，他們廣泛地、連續地舉辦各式的演講會，直接向民眾進行宣導、教育，從支部的文化講演、政談演說、農村講座到東京留學生巡回講演，掀起全島文化啟蒙的熱潮，使「文化仔」在二〇年代成為「進步」、「改革」社會標籤。

在文化運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已難有著力點、外圍團體日趨成熟、左翼路線已成氣勢的情勢下，在「走向實際運動」的呼聲中，文化協會因而分裂。

左翼的連溫卿、王敏川掌控文化協會，改走階級鬥爭路線。右翼的蔡培火、蔣渭水另於 1927 年 7 月 10 日，成立台灣民眾黨（台灣歷史上第一個政黨），從事政治運動路線。<sup>10</sup>

轉換方向後的文化協會，以連溫卿為中心，本部設於台中市，展現與舊文協時代完全不同的風貌，「主張以最大多數的台灣無產階級的解放為其目的」。1928 年 4 月台灣共產黨在上海成立，決議：「利用文化協會作為共產黨活動的舞台」。1929 年 11 月，謝雪紅及台灣共產黨掌握了文化協會，1931 年日方大逮捕台共黨員，文化協會被迫解散。

台灣民眾黨以「確立民本政治，建設合理的經濟組織及改除社會制度之缺陷為綱領。」在蔣渭水的領導下也逐漸左傾，右派的林獻堂、蔡培火等脫離，於 1930 年 8 月

<sup>10</sup> 林柏維《台灣文化協會滄桑》，頁 223-251。

，另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由楊肇嘉主導。分裂後的台灣民眾黨，由於急進的政治主張，終於在 1931 年 2 月，被禁止結社。

1935 年，台灣舉行有史來第一次選舉，台灣地方自治聯盟階段任務完成，在 1937 年 7 月，中日戰爭爆發一個星期後，自動解散，為二〇年代的台灣社會政治運動劃上休止符。

#### 4. 台灣議會之父

受到 1910 年代的國際潮的衝擊，新民會與台灣青年會的菁英省思台灣的「過去與未來」，在殖民者穩固的控管下，武力的革命路線已無可能，愛爾蘭獨立運動的模式被提了出來，引發王敏川、林呈祿等人的路線爭執，受到威爾遜「民族自決」的影響，蔡培火主張「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黃呈聰則強調台灣文化的特殊性，王敏川則偏向社會主義革命，於是決議進行廢除六三法（後來改稱三一法，是台灣總督統治的基本法）運動，最後，採納了林呈祿的主張，改走溫和的、體制內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預想台灣議會是脫離帝國統治、走向民族自決的第一階）。

於是，在林獻堂、蔡惠如的領導下，從 1921 年 1 月起，展開歷時十四年（1921~1934）、請願十五次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先是 1918 年，林獻堂召集東京的台灣留學生組織六三法撤廢期成同盟，繼於 1920 年，擔任新民會會長，發刊《台灣青年》（後來改題為《台灣》，1923 年改版發刊《台灣民報》），自 1921 年起，憑其資財、人脈，全力推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林獻堂正式投入政治抗爭的歷史洪流，奔波於台灣與日本帝國議會間，率團請願，所企圖者，欲藉由議會之路來達成台灣自治之實，進而獨立於日本之外。

總督府當局自然清楚他及其支持者的路線與目的，遂以剝奪專賣權、逼還銀行債務，來打擊他的事業，並以八駿事件來詆毀他的形象（1922 年）<sup>11</sup>，林獻堂不為所動

<sup>11</sup> 1922 年，台中州知事常吉德壽挾持林獻堂加入日台融合團體「向陽會」，並與楊吉臣、林幼春、甘得中、李崇禮、洪元煌、林月汀、王學潛等訪見總督田健次郎。當局宣稱林獻堂已向田總督保證停止台灣議會請願運動，遂引起留學生的不滿，此即所謂「八駿事件」。總督府當局更施以高壓，以所控有之銀行逼催欠債，迫使其陷入困境，林獻堂遂無奈地聲明退出請願運動，諸多學生不察，交相指斥為



，進而於 1923 年成立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以強化議會運動的成效，總督府當局遂以違反治安警察法為由，大肆逮捕同盟會幹部，拘捕 49 人，蔣渭水等 13 人被判有罪，此即治警事件。以台北師範事件（1922、1924 年）迫使學生脫離文化協會；1923 年，糾集御用仕紳另立公益會來反制，企圖分化、瓦解文化協會；1924 年，以二林事件的大起訴，壓制農民運動。

文化協會的多元發展，連帶地引入社會主義的思潮，加以，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長期受挫，使民族運動產生了運動路線的紛歧，走向實際運動（政治運動、階級運動）的呼聲高亢，林獻堂雖呼籲：「雖有誤會本會為危險，但我們須向前直進，本會以後要改造的精神，在造堅牢的大舟以準備航海。」仍無法阻擋 1927 年的大分裂，新文化協會改走階級鬥爭路線，蔡培火、蔣渭水等舊幹部另立台灣民眾黨；林獻堂陷入兩難之局，於是離台，赴歐美旅遊一年、滯留東京近一年始返台，此行開闊了他的視野，堅定地走在務實的政治改革路途上，於是召回楊肇嘉，在 1930 年成立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此際，新文化協會、農民組合、工友總聯盟、民眾黨相繼被禁，狂飆的二〇年代落幕，審度日本軍國主義勢力抬頭的時勢，政治運動勢難有發展與存在的空間，1934 年，林獻堂決定停止請願失敗十五次、進行了十四年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終於在次年得到總督府的正面回應：州郡街庄議員半套式的選舉。此一成果議會運動的標的天差地遠，徒呼奈何之際，復遭「祖國事件」<sup>12</sup>的羞辱，在軍國主義氣焰日熾的時局下，已難有所為，地方自治聯盟也於 1936 年宣告解散。

## 5. 失路於望鄉

「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王勃）

戰後的空窗期間，林獻堂協助安輯時局，竟也列名「台籍漢奸」。1946 年省參議會成立，議長一職，林獻堂最具資望，然而這位「台灣光復致敬團」的代表，卻無此機

---

「軟化」，脅迫、侮辱之書不斷，甚且有鷺江柳裳君之小說〈犬羊禍〉刊載於《台灣》雜誌，醜詆林獻堂誤族殃民。（林柏維《台灣文化協會滄桑》，頁 196。）

<sup>12</sup> 1936 年初，林獻堂率台灣新民報之「華南考察團」赴廈門、上海等地，台灣軍方竟在其回台後，唆使流氓在台中公園予以毆辱，此即「祖國事件」。



緣，旋即辭去省參議員。二二八事起，目睹台灣政治、經濟、文化之驟變，在他後來隱居東京時，寫詩道出了當時的心境：「歸台何日苦難禁，高論方知用意深；底事弟兄相殺戮，可憐家園付浮沈。解愁尚有金湯酒，欲和難追白雪吟；民族自強曾努力，廿年風雨負初心。」

1947年，萬念俱灰的林獻堂，被台灣省政府任命為省府委員，次年再任命為台灣省通志館館長，直是將之視為「前朝遺老」，寧非對一生奉獻台灣民族運動的獻堂先生莫可言喻的羞辱？情何以堪？代表台灣人尊嚴的林獻堂豈能接受這樣的擺佈？遂以養痾為名，於1949年9月，自我放逐於日本，婉拒蔣介石政府的返台規勸；守在「遁樓」，思鄉卻不歸故里，「亂絲時事任逆遭，夜半鐘聲到枕邊；底事異鄉長作客，恐遭浩劫未歸田。萬方蠻觸爭成敗，遍地蟲沙孰憫憐；不飲屠蘇心已醉，太平何日度餘年？」委婉道出他以生民為念的襟懷。1956年，思鄉不歸的林獻堂，病逝東京。

跨越三個時代，林獻堂做為台灣民族運動的領袖，隱忍持志，他當之無愧。做為台灣議會的催生者，始終如一，他無怨無悔。然而，漢民族意識強烈的他，對於「夢土中國」的到來，他卻無言以對。終生反日的林獻堂，在戰後卻選擇自我放逐於日本，實則透露對蔣介石政權深沉、無言的抗議，也顯現出台灣人無法掌有自主權的悲哀。

